

明代理学向心学的 转 型

——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



**The Transition from Zhuli Theory to the
Heart-mind Theory in Ming Dynasty**

On Wu Yubi and ChongRen School

● 邹建锋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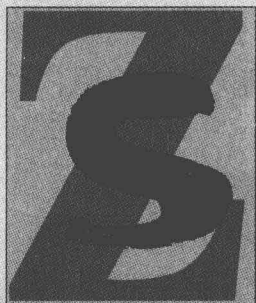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

——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



**The Transition from Zhuli
Theory to the Heart-mind
Theory in Ming Dynasty**
On Wu Yubi and ChongRen School

● 邹建锋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邹建锋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ISBN 978-7-5097-2833-8

I. ①明… II. ①邹… III. ①吴与弼(1391~1469) —
理学—哲学学派—研究 IV. ①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2348号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

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

——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

著 者 / 邹建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高忠磊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5

版 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字 数 / 213千字

印 次 /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833-8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立足地方实践 高扬中国特色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总序

人类社会踏上了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1 世纪，世界各种文明和思想文化经历着深刻的激荡和变革。面对这样的形势，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因此，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职责的哲学社会科学，任重而道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是人类历史中前无古人的创举，需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不懈的探索，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 2003 年 7 月 1 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这三个重大课题为主攻方向，同党和人民一道，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努力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在2004年3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辟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 and 作用，指明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个文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必将唤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中国人民进行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的使命感，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

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多年来，除台湾省之外，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计划单列市先后建立了社会科学院，总数已经达到44家。可以说，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在各省（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地方社会科学院在队伍建设、科研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和可贵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大批立足地方实践、富有地方特色的优秀科研成果，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立足地方特色，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相信《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作为一个多系列精品工程的编辑出版，能够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展示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及其固有特色，激励和推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提高，有益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繁荣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大家共勉，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迎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美好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4年8月15日

承继浙学优秀传统 促进当代学术繁荣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序

浙江学术有很多优秀的传统。

首先一点，浙江学术富有批判精神。汉代中期以后独尊儒学，当时的儒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墨守章句之学；二是盛行讖纬迷信。浙江人王充“退孔孟而进黄老”，对传统儒学提出尖锐批评，提出“神灭无鬼”的新说。他所开创的学术新风气对后来魏晋玄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新儒学产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流派。浙江产生了“浙学”，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倡言事功，充分强调“利”的正当性。在南宋三大儒学流派中，他们于朱、陆两家之外独树一帜，不但成为宋学不可或缺的一支，也对此后浙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定于一尊，至明后期，余姚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新说，突破朱熹“天理”的绝对性，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晚明文学艺术界有一股提倡人性解放、不拘一格抒发性灵的社会思潮，王氏之学，有以导之。至清代，考据之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浙江学者，不但为后人贡献了大量考据学上的成果，而且产生了章学诚这样的反潮流的学术大师，他强调“六经皆史”，标榜“浙东学术”的独特个性，与吴、皖两家相颉颃。至于清末，学风再变，程朱理学与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浙江不但产生了龚自珍这样的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还产生了孙诒让、黄以周、俞樾这样的朴学大师，号

“清末三先生”。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浙江学人在其中的地位清晰可见：他们未必是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主导者，却常常是某一时期主流学术的批判者；而他们所开创的学术新风，又常常引导着下一时期的学术新方向。浙江学人的这种批判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精神。

浙江学术的另一优秀传统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南宋“浙学”思想家们主张重商富民，正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体现。到明清时期，浙江学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不但在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在政治上更是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前所未有的批评，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不朽的标杆。清代浙江学术的地域风格已经形成。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学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上。清代文禁极严，明史研究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学术领域。浙江受文字狱之祸极深，著名的“明史案”便发生在浙江。当时很多历史学家为了避祸，在研究中有意避开这一禁区，专攻古史考证。而浙江学人，敢于逆流而上，浙东学派尤以明史研究见长。黄宗羲撰《弘光实录》、《行朝录》、《明儒学案》，选编《明文海》；万斯同一生专治明史，独力完成《明史稿》五百卷；邵廷采撰《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明遗民所知录》；全祖望著《鮑埼亭集》，撰集碑记，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浙东学人的明史研究，表面上是研究历史，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政治问题，他们的学问，表面上是史学，骨子里是政治学。在这一点上，浙江学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可理解成是一种革命精神。至于近代，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他的学术成就固以朴学见长，但在他的学术理论中，“种族革命”的特色表现得特别浓厚。这与浙东学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与勇气。

浙江学术的第三个传统是包容的态度和开放的精神。浙江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的中间地带。在历史上，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变，数次大事件引发的移民浪潮，都对浙江学术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南宋“浙学”三家，婺学（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本来就

是北方世家；永嘉学派，源自北宋“永嘉九先生”，他们与“二程”有师承关系。各种区域文化的交汇碰撞，造就了浙江学人包容的、学习的态度。浙江又地处沿海，在明清以后“地理大发现”的国际背景中，又成为“西学东渐”的前沿。早在明末，就有杭州人李之藻，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习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科目的引进和建立中，浙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沈家本在法学上，蔡元培在教育学上，马寅初在经济学上，都堪称是一个学科的开创者或奠基人。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以“兼容并蓄”治校，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育了土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译介西方文学，并用新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旧学问开始转型。海宁人王国维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有着巨大影响的国学大师，在哲学、文学、史学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在哲学上，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等人哲学思想的人，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最早运用西方美学对《红楼梦》进行学术批评的著作；在文学上，他著有《人间词话》，提出“境界”与“意境”说；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最早对甲骨文进行识读且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学者之一，他首创“二重证据法”，将甲骨文与存世文献进行对照分析，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浙江先贤的学术传统，是我们不朽的楷模。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坚持以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突出浙江特色，强化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和为全省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功能，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贡献。为了更好地发挥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的功能，推进“精品工程”和“人才工程”的实施，从2001年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设立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金，陆续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从2004年起，

又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丛书，使科研成果的出版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扩大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影响。

这些学术成果，有的重视社会调查，重视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关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有的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地方史事的钩沉以及区域文化的理论探讨；当然，其中不乏越出地域之囿、站在学术前沿的创新之作。这些成果，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些问题在学术上还有争论，有的还有待社会实践以及学术自身的发展来检验，但它们有鉴别、有批判、有创新，这正体现了浙江学术的优秀传统。

林昌建

2009 年

序

明代是心学替代程朱理学，由隐到显、由小到大的时代。自明代中叶以降，阳明心学风靡神州大地，阳明后学不同流派在各地广为流传，时人称之为“家孔孟而人阳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对心学演变过程历史的研究，自然成了明代哲学史研究的核心课题。清初黄宗羲对此有个了断：“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此一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一般均以为陈献章为明代心学的鼻祖，到王阳明则集了心学的大成。这个结论并无大谬，但不能说全面厘清了明代心学史的真实面貌。陈献章之前有他的老师吴与弼，其白沙之学是从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传承下来的。崇仁学派门人不少，在明初影响很大。吴与弼及崇仁学派，实为明代心学的“始入精微者”。在我看来，研究明代心学史，不涉及吴与弼及崇仁学派，是讲不过去的，至少是影响了对它真实面貌的认识。

邹建锋这本专著，是一本以崇仁学派为核心，对15世纪明代心学史作较为系统与深入研究的著作。在对崇仁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发掘的基础上，作者从道德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心理学的多元化的诠释路径，对15世纪明代心学史做了较为清晰的分析，克服了以往过分重视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对阳明心学影响的倾向，突出了吴与弼的心学思想对陈献章和王阳明心学的启迪意义。这是颇有新意的创见。

作者通过对吴与弼良心观与陈献章“端倪说”的分析，断言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是对吴与弼养良心观和陈献章“端倪说”的发展和

推进。在对吴与弼“良心”、陈献章“端倪”和王阳明“良知”，这三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作了详尽的剖解后，认为程朱理学向明代心学转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作者大胆提出，崇仁学派心学思想为阳明学先行者的主张。这为15世纪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阳明心学研究的深入，也拓宽了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围。我觉得这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见解。阳明心学的崛起，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里，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体系或大思想家的产生，均须经过若干年代的孕育、酝酿，由零星到系统，是综合了前人的心思才力，之后方能告成的。如同滔滔的大江长河，必有为数众多的小溪小川作为它的源头一样。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大川，它们发源于青海，源头竟是几股潺潺的细流。自然界的生态是如此，哲学史发展的原生态也不例外。哲学史是一个有必然性的发展中的系统，前人提出的见解是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每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影响的哲学，它的核心概念是不会被消灭的，而是作为一个环节保存在后起的、最丰富的哲学体系之中。如黑格尔所言：“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①以往对哲学史研究有一种倾向，即过分注重大哲学家或成熟状态著作的剖析，而不太关心那些二三流学者的考察。于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哲学史，常常是一个一个点的组合，或列传式的人物展示，而不是一条发展中的系统，或立体式的全方位的体现。哲学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不单要关注大哲学家，也要注重其他学者的观点。就此而言，这本专著是符合人类哲学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

以上是从宏观的角度说的，宏观把握是以微观研究为基础的。对吴与弼理学思想的宏观把握，就必定涉及其理气观、理心关系、心体说、性体说、存理去欲、静敬工夫等诸多细节的分析。作者对它们的研究是细致入微的。在这一前提下，作者通过吴与弼、陈献章、王阳明三人心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40页。

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吴与弼心学是阳明心学先声的主张。这是在做阳明前学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对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足足热闹了二十多年。这一状况到近年来方有转变。学术界对阳明后学的研究上，有个不小的高潮。就其大者而言，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阳明后学著作的面世，凤凰出版社于 2007 年推出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辑，共 7 种 10 册，其中有《王畿集》、《罗洪先集》、《罗汝芳集》等；二是阳明后学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 2009 年推出了《阳明学研究丛书》，内有《浙中王学研究》、《江右王学研究》、《泰州学派研究》等。但是对阳明前学的探讨，则显得相对冷落。《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的面世，对阳明心学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是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的。

对学术界较少论述的胡居仁、夏尚朴和洪垣等人的思想，作者从崇仁学派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书末附录的 6 万字的吴与弼和胡居仁年谱，可以弥补清儒杨希闵所作二人年谱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基础。这都是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少的内容，这一部分也是值得一读的。

以往谈及科研时我告诉学生，分析要细，理论要深，这是做学问的基石。邹建锋作为我的学生，他是照这八个字去努力的。如对吴与弼心学体系的分析，就极为细致入微，析出天心、本心、初心、真心、道心、素心、芳心等诸多范畴。天心为主宰天地万物的核心、芳心是天心落实到天地万物的表现、本心指人心的本来状态、初心系学者立志入圣的发愿、道心是心的道德化状态、真心是检验人的修养能否达到道德的标准、素心是修养工夫中的目标，指摆脱外在事物的自我超越之心态。如此的剖析，无疑是很有力的，对明代心学研究的深入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也应该看到，这本书研究对象是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及其门下众多传人，内容相当广泛，应当有个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正是鉴于这样的客观情况，在容纳了大量资料的同时，也有着理论不够深刻之处。希望邹建锋今后在这些方面，花大力气增进自己的理论

基础水平。

记得我上《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发觉邹建锋做的作业中是有学术气息的。他不但正文符合我的要求，而且附了不少脚注，详细注明了作者、书名、版本等出处。他的身上有着一股向往学术殿堂的内在精神，不像有些学生是在“混学分”，作业东抄西拼，马虎得很。自此后我开始关注他，而他听我课时总是坐在前三排。自同济大学毕业后，他与我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他考取苏州大学的中国哲学史博士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更为紧密了。在博士论文出版前，他把书稿交给我，要我写个序。对于这样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后起之秀，我是难以拒绝的。

朱义禄

2010年7月19日于沪上

内容提要

本文围绕吴与弼哲学思想对陈献章、王守仁的影响，及崇仁学派在整个明代哲学史所处的地位，展现崇仁学派儒家学者的理气观、心性论与道德修养论，凸显 15 世纪明代哲学史的真实面貌与内在理路，为理解阳明心学的兴起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论文在理学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三维分析方法安排下，深入一手古籍资料，以崇仁学为思考对象，认为吴与弼是明代儒家心学的开山人物，陈献章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胡居仁是 15 世纪心学巨子，崇仁学为阳明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思想史背景。

第一章指出，崇仁学派在理气关系总体上继承程朱思想，但重视气在宇宙生成中的作用，融气入理。与明初诸儒一样，吴与弼主元气说。他借鉴并消化二程的真元之气说，重提元气说。以元气为本原而展开的天地万物之理便具有道德性与生理性。吴与弼弟子陈献章以自然之道为元气，形成以自然为宗、自得为大的学术体系。胡居仁则将元气统一于理中，重中心与理本一（心理合一），增强理的义理性，形成唯理主义学说。其后，余祐的理气新论、夏尚朴的理气相合、湛若水的元气说、魏校的气具理与洪垣的真气说，组成一幅生动多样的画卷。在理气观上，15 世纪儒家学者的哲学本体论呈现出回归气本论的趋势。在心理合一说上，吴与弼、陈献章和胡居仁分别提出良心、端倪和实理概念，表现出他们三人在道德本体说上的一致性。

第二章认为，吴与弼的心性论具有多元性。通过读书、沉思与自我觉悟等方式，吴与弼将朱熹的客观之理内化、主观化，开出心学新局

面。吴与弼通过本心、天心、初心、道心、活物之心、真心、素心、芳心等概念展开对心的义理探索，整合孔孟与程朱对心的认知，廓清与扩展儒家对心的认识。吴与弼还提出天性、德性、本性、真性、中和性等概念，丰富儒家对性与天理关系的认识。吴与弼“理在心中”思想通过门人娄谅、胡居仁与陈献章等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崭新的心学思潮，为阳明心学的兴起提供思想史背景。胡居仁的“本心即理”、“理心本一”和陈献章理心吻合、凑泊说均与王守仁“心即理”说内涵一致。胡居仁重中心与理本一、合一的命题，强调人的本心对外在客观之理的认识。寸心（灵台、灵府）可以发现与人对待之天理，理心合一，理心相契，为明代心学的大明开启提供思想史背景。把握事物之理需要开发人的道德本心。本心的发现以读书穷理、静坐和居敬等方法为下手工夫，明初的道德修养论渐趋细密。总之，吴与弼心学诸概念与阳明心学诸概念一致。吴与弼由工夫而证本体的理契于心的感悟与王守仁“心即理”工夫进路异曲同工。吴与弼师徒的理心合一观已入精微，开启明代心学，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

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聚焦崇仁学派各学者的心性工夫论（也叫道德修养论），基于理欲的内在张力而展开的敬静关系着眼。围绕着存理克欲，吴与弼主审理克欲，夏尚朴主理欲消长论，湛若水、洪垣则主随时体认天理；而吴与弼的养良心与陈献章“养端倪”、王守仁的“致良知”存在一致性。围绕着敬、静，吴与弼提出静时敬、陈献章主静、胡居仁主敬、林光主静养动应，魏校提出敬做主宰，夏尚朴提出敬自静。吴与弼弟子（陈献章与胡居仁）从敬静的不同层面继承与发挥吴与弼的“静时敬”工夫论。陈献章追求静坐中的善端呈现，放弃传统程朱学的读书入经，并发展成为一种教法，以觉悟证心体。胡居仁以读书穷理为把握真理的方法，试图矫正陈献章究虚理的缺陷。

第五、六章分别从生存空间和内在义理两个层面继续深入分析崇仁学。崇仁学派、余干学派和江门学派博文约礼，潜心理真，分别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镇。透过对江西崇仁、余干、上饶和广东新会等学术中心

发展、壮大和衍流的梳理，可以看到心学在与传统理学的辩论、“唾骂”和交往中逐渐发展并日益扩大，获得读书人的认同与研习，为阳明心学的大明提供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以崇仁学为主干的 15 世纪心学史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冲突与交锋，尤其是陈献章和胡居仁之间的学术分歧。在同门之间的学术分歧背后，隐藏着心学涌动的新潮流。陈献章和胡居仁分别从“终贯系统”和“横摄系统”发展崇仁学，体现为高明心学与实在心学的不同诠释路径。从“心与理一”到“理与心一”，从主敬到主静，表现出崭新心学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而阳明心学的出场标志着程朱理学的暂时性终结。阳明心学由于海纳百川，直指心体和性体，体现出较为完备的心学形态。16 世纪心本体论异军突起，成为与理本论和气本论并驾齐驱的思辨方式之一。明代心学蔚为大观，其源流之功，首推 15 世纪儒家吴与弼无疑。

最后一章探讨崇仁学与宋明理学的内在思想关系，及崇仁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江门学派与余干学派的思想对王学的产生起了“启明”、“发端”作用。明代学术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以蕺山为后劲”。15 世纪明代哲学史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为学路径：一派以胡九韶、胡居仁、魏校、夏尚朴和杨廉为代表，坚持理的实用性与至上性，心之知觉可把握理；另一派以娄谅、陈献章、湛若水、林光为代表，自得为己，向内用力，抬升心的认知能力与个体的独立性，心包含理。王守仁以即心即理的直觉主义打破此种平衡，引发新的学术潮流，成为明代儒家哲学的主流。

总之，通过对吴与弼的养良心、陈献章的“养端倪”和王守仁“致良知”核心思想的分析与研究发现，明代心学的发展脉络呈现出蔽旧成新、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的特点。良心、端倪和良知三个概念均体现出理心合一、德性内聚于生理之心的特性，而养良心、“养端倪”与“致良知”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工夫过程。15 世纪明代心学史的内在理路呈现出一致性，明代学脉在促进学术发展的进路上长盛不衰，而作为良心的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价值都得到坚守。